

金庸

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

余 醴◎著

◎ 吉林大学出版社

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

余 醴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 / 余醴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677 - 8307 - 2

I. ①金… II. ①余… III. ①金庸 - 侠义小说 - 小说

研究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8255 号

书 名: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

作 者:余醴 著

责任编辑:朱进 责任校对:朱进 贺迪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2.2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8307 - 2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印刷

2017 年 1 月 第 1 版

201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3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95800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作者简介

余醴(1979—)女,汉族,湖南株洲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讲师、省级普通话测试员。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院报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通俗文学。公开发表多篇论文、散文作品。主持和参与多项省级、院级课题。曾获湖南省说课比赛二等奖。

前 言

中国武侠文化源远流长,从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到班固的《游侠传》,再到后来的各种“侠”故事、“侠”小说,进而形成的“侠”文化,这已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一部分,也虽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特质。特别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梁羽生、金庸等人开创的“新武侠”,为我国的武侠小说、武侠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以金庸的小说最为成功,不仅风靡了整个华人世界,带动了影视、游戏改编的种种热潮,也进入了中学的课本、大学的讲堂,进入了学者们学术研究的视野。

本书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三大部分,分别从金庸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以及金庸武侠小说的贡献这三个方面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中感受金庸武侠的文化魅力与价值。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上篇 金庸武侠小说

第一章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学	(19)
第一节 武功	(20)
第二节 秘籍(笈)	(43)
第三节 武器	(50)
第二章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江湖	(62)
第一节 所谓“江湖”	(62)
第二节 江湖门派	(64)
第三节 江湖地盘	(73)
第四节 江湖阵势	(76)
第五节 江湖规矩	(78)
第三章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名字	(86)
第一节 相关人物取名	(86)
第二节 按照意义和需求取名	(91)
第四章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爱情	(97)
第一节 洒脱的至情至爱	(97)
第二节 感人至深的生死离别	(101)
第三节 患难夫妻情	(105)
第五章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英雄	(110)
第一节 恪守传统的铮铮英豪	(110)

第二节	任情任性的孤苦侠士	(113)
第三节	滑稽可爱的市井顽童	(115)

中篇 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

第六章	侠文化的透视	(121)
第一节	侠文化的起源及发展	(122)
第二节	金庸小说引发的武侠时代到来	(129)
第三节	后金庸时代的侠文化	(133)
第七章	从武侠小说视角审视的文化发展	(138)
第一节	文化的传承	(138)
第二节	文化的创造	(145)
第三节	文化的发展	(149)
第八章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	(151)
第一节	传统文化价值	(151)
第二节	历史文化价值	(154)
第三节	通俗文化价值	(156)
第四节	审美文化价值	(157)

下篇 金庸武侠小说贡献

第九章	现代化当代化的武侠小说	(163)
第一节	现当代武侠小说源于金庸和古龙	(163)
第二节	金庸小说对现代武侠小说的改造	(169)
第十章	金庸小说对武侠电影的影响	(174)
第一节	金庸小说成为武侠电影的主要素材	(174)
第二节	金庸小说引领了影视剧改编潮流	(179)
结语		(182)
参考文献		(186)

绪 论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浙江海宁查氏是当地望族,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大学主修英文和国际法。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所获荣衔甚多,包括:1981年英国政府O. B. E. 勋衔,褒扬其对新闻事业及小说写作的贡献;1986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博士,表扬其对社会工作及文学创作的成就;1988年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名誉教授;1992年加拿大UBC大学Doctor of Letters;1994年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以及1996年剑桥大学荣誉院士等。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他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

一、金庸生平与著作

1929年5月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

1936年入嘉兴一中读初中,离开家乡。

1937年日军入侵,因战事而随学校辗转余杭、临安、丽水等地,后1938年于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初中部就读。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他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收效不凡。

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

1948年毕业。

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

1948年调往香港分社。

1950年曾赴北京到中共外交部求职,后重入《大公报》。

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期间与同事梁羽生相识为友。而后总编辑罗孚安排查与梁写武侠小说于副刊连载,梁羽生编写《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书剑恩仇录》,引起轰动,顿时金梁齐名。

1956年,与同写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随笔,给“新派武侠”留下了一段历史见证。

1956年在《香港商报》全年连载《碧血剑》

1959年于自办的《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

1953年至1958年期间,他曾以林欢作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其中《绝代佳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金章奖。同年与导演合作过两部电影,与程步高合导《有女怀春》及胡小峰合导《王老虎抢亲》。也曾以姚馥

兰为笔名撰写电影评论,还为电影歌曲填词。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系列报刊,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

1973年春,金庸应台湾地方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蒋经国见面会谈。“文革”结束后,金庸分别在1981年、1984年来到祖国大陆访问,并先后在北京获邓小平和胡耀邦接见。

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作为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5年至1989年,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

1989年金庸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同年在《明报》创办30年庆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

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1亿元。1991年明报集团香港上市后,他退出报业管理层,于是他从此去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他在1991年的《资本杂志》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名列中排第64位,他亦被誉为文人致富的典型。1991年明报企业上市,金庸任董事长并签订3年服务合约,与于品海达成协议由智才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

1993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访问,并获江泽民接见。同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更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宣布全面退休。

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第一部英译本。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名。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第一部生平传记《金庸传》在香港出版。同年,金庸返乡参加嘉兴一中90周年校庆并于嘉兴高专兴建“金庸图书馆”。图书馆落成后再斥资1400万元在西湖兴建“云松书舍”,供个人藏书、写作和与文友交往雅集之用。

1996年秋当“云松书舍”落成后,金庸改变初衷,毅然捐出斥巨资兴建的书舍,现已成为杭州的新旅游景点,内藏金庸作品及手迹陈列室等。

1999年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担任香港廉政公署市民咨询委员会召集人、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

1995年,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筹委会委员。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名衔。

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院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2011年,国立清华大学授予金庸名誉博士学位院士。

2015年,金庸授权北京市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将《鹿鼎记》改编为评书,由“连派评书”唯一继承人连丽如及其弟子播讲。

1994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第一部英译本。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名。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第一部生平传记《金庸传》在香港出版。

金庸的作品包括:

1. 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以上各书均曾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广播剧、舞台剧等,其中若干作品已被译成英文、泰文、越南文、法文、马来文、韩文等在海外流传,日文版亦将由德间书店于1996年9月起陆续出版,其作品销路长期高踞华人社会之榜首。

2. 政治评论:撰写《明报》社评二十余年,有《香港的前途》评论集。

3. 散文:有随笔、电影评论、戏剧评论、佛学研究及历史人物研究《袁崇焕评传》等。

4. 翻译:已出版者三种,在报刊连载者四种。

5. 电影剧本:十余种,电影剧本《绝代佳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金章奖。

二、金庸小说研究

1980年10月《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1981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印行《书剑恩仇录》。自此，金庸的小说逐渐在大陆流传，但这种传播大多以盗版形式，并非出自金庸本人的意愿。1985年这一年金庸小说销售了4000多万册，几乎都是盗版。其中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经金庸授权发行了50万套《书剑恩仇录》，校印认真，并依据合同支付版税。在1985年第4期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上，张放发表了《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这是大陆第一篇金庸小说的研究论文。

面对突如其来的武侠小说热，有人厉词声讨，斥之为“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有人如临大敌，提出应采取严正措施并有所防范；有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热，严重地冲击了纯文学，向纯文学提出严重的挑战，新武侠小说审美趣味低下。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红学家冯其庸出来为金庸辩护，他在1986年第8期的《中国》月刊发表《读金庸》，认真评述了金庸小说广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认为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作“金学”是有道理的。有一段时间，冯其庸的声音是寂寞的。到了1988年，《读书》《文艺报》《上海文论》等文艺类的核心报刊分别刊登柳苏《金色的金庸》，章巽《台港“金学”一瞥》，裘小龙、张文江、陆灏《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等文章。而这一年，引起广泛争论的是文学家章培恒发表在《书林》第11期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曾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当时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这是一次直率的发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说自身的范围，而大胆介入祖国大陆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多综论金庸，如张颖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正邪一统观》（《蒲峪学刊》1988年第3期），唐解放等的《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6期），张越的《金庸武侠小说中人物塑造的特点》（《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黄振源的《铁血丹心，侠骨柔情——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小说评论》1989年第6期），竺亚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金庸武侠小说及金庸谜一解》（《华文文学》1990年第1期），虽向中的《“金庸”意境》（《书林》1990年第3期），宋文缙的《评金庸的“新

武侠小说”》(《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吴秀明等的《金庸:对武侠本体的追求与构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等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金庸小说的研究逐渐深入。严伟英在《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上发表《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把金庸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59年以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人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从1959年的《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彻底反省早期不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年至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人生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批判,同时反映作者从过于入世的人生观摆脱出来,寻求朴素与自由的人生。吴秀明、陈择纲在《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一文,立足于时代转型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金庸对武侠小说现代性所作的贡献,认为这种现代性是金庸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文类的陈旧落后思想的一次革命性改造(《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鞠继元《论金庸小说与新神话创作》(《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周泉《后风格错觉与语言致幻剂——金庸武侠小说的三重解读》(《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徐岱的《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徐岱《论金庸小说中的信仰之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2期),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等文章,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金庸小说。

20世纪90年代,金庸小说也开始走向大学讲坛。陈平原在1990年就开设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相关课程,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准备和写作时间也是这一时期。严家炎在1995年春为本科生开讲“金庸小说研究”,其后根据自己讲稿整理而成的《金庸小说论稿》,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首先从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研讨武侠文化的作用,试图澄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的误解与偏见。全书综合而系统地考察金庸小说“义”,“武”,“情”的三维组合与作品的现代精神,情节艺术,生活化倾向,影剧式技巧,以及金庸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并从文学雅俗对峙的角度衡定了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第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博士论文也出自北大,这就是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1997)。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红学家冯其庸对金庸的推崇还略显寂寞的话,90年代开始,金庸研究就逐渐成为热点。陈墨、陈平原、严家炎、徐岱等学者教授纷纷著书推许。这些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多是从综合考察开始,再分析单部作品,并兼及小说人物研究。进入21世纪,随着“重写文学史”讨论的深入,对金庸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人们不单单从作品本身出发,逐渐把目光投向文化的思考、多维的比较。如严家炎的《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孔庆东的《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徐保卫的《金庸小说中的鲁迅维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徐晋如的《作为反〈红楼梦〉的〈鹿鼎记〉》(《论文集》)等等,另还有与大仲马、塞万提斯等的比较研究。

对金庸笔下人物性格探讨也越来越细致和深入。如康序、陈颖灵的《此侠只应中华有——谈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主人公段誉》(《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是最早的金庸小说人物论。而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第一部著作是曹正文的《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6年由学林出版社出新版,增“范蠡”篇。以后的单篇论文有陈薇的《一曲人间悲歌——看金庸笔下的萧峰》(《通俗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陈墨的《虽万千人吾往矣——萧峰论》(收入《孤独之侠》),周志强的《论萧峰形象的文化蕴涵》(《华文文学》2001年第2期),陈墨的《段誉形象及其意义》(收入《孤独之侠》),陈墨的《不识张郎是张郎——张无忌形象散论》(《论文集》),黄立华的《浪子的颂歌——令狐冲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4期),龙雍生的《萧峰的儒家之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董瑞生的《环境、性格、命运——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语文学刊》2005年第6期)。

在金庸小说研究方面,文字量最大的是陈墨。陈墨已经出版了12本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著作,包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金学研究系列”7种:《金庸小说赏析》(1990),《金庸小说之谜》(1992),《金庸小说人论》(1994),《金庸小说艺术论》(1994),《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1995),《金庸小说之武学》(1996),《金庸小说情爱论》(1996);上海三联书店的《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1999),《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2000),《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2001),《英华之咀——金庸四部佳作回评》

(2002);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武林文宗·金庸》(1998)。其中,《金庸小说之武学》《金庸小说情爱论》在1993年曾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为《金庸武学的奥秘》和《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对金庸及其小说的文化学思考,也开始得很早。如金庸为什么在写作的巅峰时期毅然搁笔?刘爱华、唐峻山的《走向寂寞:金庸“功成自退”的文化意义的尝试性心理描述》(《艺术广角》1992年第5期)对此做出了思考。钟晓毅的《拔剑四顾心茫然——略论金庸小说中的孤独退隐观》(《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张乐林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也可一读。而吴晓黎的《90年代文化中的英雄——对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流行的考察》(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展示了金庸怎样在90年代逐渐占据文化英雄位置的过程。同类的文章有陈尚荣《90年代文学语境下的金庸》(《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和《金庸能走多远?——关于金庸热的文化语境透视》(《当代文坛》2002年第1期)。金庸小说中所承载的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颇引人注目。卢敦基认为:金庸一方面利用厚重的古代文化思想,用作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儒、道、释遥遥相对,一方面又利用《侠客行》《鸳鸯刀》《鹿鼎记》体现了反文化思想,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何平则从儒学角度解剖金庸,认为金庸自儒入手,以反儒为结束(《侠义英雄的荣与衰》,《读书》1991年第4期)。胡河清看到:金庸小说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独有的视点,由此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化范围内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情感形态(《金庸小说的伦理情感》,《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周宁通过对金庸小说文本研读,指出武侠小说的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对金庸小说中男权思想进行批判的论文有3篇,即丁莉丽的《金庸的悖论:传统男权尺度与现代女性观》(《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芦海英的《情爱世界的阴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3期)和彭红卫的《男权的狂想与没落——论金庸、古龙小说中的男权意识》(《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对于金庸的研究也日趋多元化。如贾耘田的《中国武术文化与金庸小说的武打艺术》(《通俗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冷成金的《金庸小说与民

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孔庆东的《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方伯荣的《试论金庸精神》(《嘉兴教育学院、嘉兴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金庸研究专辑),李咏吟的《金庸小说叙事与民间文化理想》(《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吴晶的《金庸小说的江南情韵》(《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徐岱的《论武侠文化——关于金庸小说的人文思考》(廖可斌编《金庸小说论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龚刚、骆轶航的《金庸小说的文化阐释》(《论文集》),胡小伟的《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禹康植的《论金庸武侠小说中“武”的特色》(《华夏文化》2004年第1期)和《论金庸小说中“忠”与“孝”的表现与超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1期),袁杰的《试论金庸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1期),龙彼德的《美,在他心目中的中华——论金庸小说的民族特征》(《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张群芳《金庸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傅如一、魏晓红的《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施爱东的《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杨春燕的《金庸:一个传统文化审美神韵的自觉追求者》(《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廖斌的《无父、审父与弑父:金庸小说人物设置与命运模式解读》(《南平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严家炎的《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孔庆东的《论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李存的《论金庸小说的悲情意识》(《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田智祥的《对金庸武侠小说批评的思考》(《菏泽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从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看金庸武侠小说对大众文化建构的启示》(《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金庸武侠小说的现实指涉与理想人格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由社会乌托邦的营造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文关怀》(《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高东洋的《刀光剑影话金庸——对金庸小说争鸣现象的历史考察》(《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吕晓明的《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审美内涵》(《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王维燕的《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模式的成因》(《中华女子学院学

报》2005年第1期),张根柱的《历史文本的传奇化与文学文本的历史化——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历史写作策略》(《华文文学》2005年第1期),胡小伟的《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张乐林的《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最早将金庸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是文学史家章培恒,他在《书林》1988年第11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引起广泛讨论。《李自成》一文第二卷曾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当时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这是一次直率的发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说自身的范围,而大胆介入祖国大陆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域。此外,章培恒还写了《金庸武侠小说与新思想》(《论文集》)一文。其后的比较多在通俗文学范畴进行,如曹正文的《金庸古龙比较说》(《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相关文章还有张景的《金庸与古龙》(《今古传奇》1992年第1期)、张弢的《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中华传奇》1995年第6期)和余杰的《求索真自由——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论文集》);林文勤的《金庸与张恨水小说之比较》(《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和孔庆东的《张恨水与金庸》(《论文集》),以及陈金泉的《从〈红楼梦〉到张恨水小说:中国小说艺术一条永不竭的长河——兼论张恨水与金庸之比较》(《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首先将金庸和外国作家比较的,是宗源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发表的《金庸、勒卡雷异同论》。勒卡雷是一位成功的英国间谍小说作家。而陈墨将金庸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考察,显得视野开阔。他把《鹿鼎记》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世界名著《唐吉珂德》比较后认为,《唐吉珂德》是一部杰出的讽刺艺术佳作,《鹿鼎记》则是一部优异的幽默艺术杰作;《唐吉珂德》的诞生,标志着西方骑士文学的终结,骑士的时代迅速地被法律的时代所代替,而中国人对武侠文化的喜好,至少心理上潜藏着古代农业文明的价值积淀:前者追求理想,后者认同现实,两者都是各自作者在各自的时代卓越的艺术创造,而且也是对各自时代最敏感、最深刻的把握(《〈唐吉珂德〉与〈鹿鼎记〉比较初论》,收入《孤独之侠》)。严家炎选取了小说与历